

1980年來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 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綜述

顏小華

[摘要] 學界一直較為關注近代澳門基督教史及相關問題的研究。1980年以來，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有關近代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於鴉片戰爭前後時期，成果層出不窮，無論是傳教士或教會個案、教育、醫療、文字印刷出版等活動，還是該時期澳門基督教史的整體性通論，都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不過，有關整個近代中國澳門基督教史的發展情況尚存一些問題和不足，例如部分文章史料堆砌，理論探討嚴重不足；論文大量徵引他人成果，卻無注明出處或注明不詳；某些涉及該時期中國基督教史的文章人云亦云，人錯己亦錯；對19世紀後半葉及20世紀上半葉時期的研究關注不足等，值得學界進一步研究和關注。

[關鍵詞] 澳門 基督教史 綜述

澳門是中國接觸近代西方器物與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同時亦是近代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第一站。從19世紀開始，伴隨着西方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步伐，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洋人、西洋建築和西洋文化開始大規模傳入澳門。從此，澳門成為中西貿易重要的國際港，基督教來華最重要的傳教基地，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名副其實的“中國近代第一城”。

有關近代澳門基督教（本文概指基督新教）歷史，過去不同學界如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及國外學界都曾作過大量的研究，但礙於語言、學術興趣、取得文獻、訊息流通、學界交流等不同因素，不同學界的研究焦點和領域都各有側重。為使相關研究者瞭解現時中國內地學界對近代澳門基督教史的研究情況，筆者以1980年以後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文章入手，^① 探究其研究整體情況，以供學界參考。不當之處，敬請教正。

一、近代澳門基督教史的綜述性研究

近代澳門基督教史的研究，興起於1980年代初，1990年代成果相對集中，2000年代後開始激

作者簡介：顏小華，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桂林 541001

^① 本文以中國內地收錄期刊較全面的“中國知網”入手，查詢的文獻包括學術專論、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學術會議論文等，關鍵詞搜尋為“澳門”、“基督教”、“新教”、“西方宗教”、“傳教士”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中國內地研究者如台灣的蘇精在內地期刊發表研究成果，對內地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增。關於近代澳門基督教史方面的概述性文章，可讀性較強的有李桂玲的《澳門的宗教》一文。她在文中概述基督教在澳門的歷史雖然只有180餘年，但澳門卻是中國最早傳入基督教的地方。1807年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首先在澳門傳教，以後西方傳教士也將此地作為進入中國大陸的基地，西方新教各派均派遣傳教士來到澳門，發展教徒，建立教堂，開辦教會，但教務的發展很緩慢，20世紀40年代以前只有3所教會，70年代中期以後教務發展迅速，1985年時共有33所教會。^①1999年，基督教會宣道堂港澳區聯會主席藍欽文在《天風》雜誌“迎澳門回歸”專欄中發表文章《澳門基督教簡介》，這是一篇比較全面概述澳門基督教史的短文。作者用簡短的篇幅，從馬禮遜、米憐（William Milne）、蔡高、梁發和英國倫敦傳道會寫起，隨後又介紹了美國浸信會、聖公會等差會以及中華基督教在澳門的傳教情況。^②與此同期，周大寧在《四川統一戰線》之“話說澳門—迎接12.20澳門回歸（六）”發表文章介紹澳門基督教，同樣地，該文筆墨不多，但對馬禮遜在傳教、聖經翻譯、創辦學校、培養華人學子方面進行了客觀的評述。^③通過藍文和周文，可大致認識到基督教在澳門的發展歷程。

此外，劉先覺、許政在《澳門的宗教建築》中也記載——澳門是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地方，首位來華的新教宣教士是馬禮遜，他於1807年來到澳門，亦是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1814年培養出中國第一位基督徒蔡高，1823年任命梁發為第一位華人牧師。馬禮遜學堂於1839年11月4日成立，開設中文、算術、代數、幾何、地理、生理學、歷史等課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具有西化知識的人才。其後基督教新教各派都有傳教士來澳門發展教徒、建立教堂、開辦教會，但教徒人數增長緩慢，直到19世紀下半葉，澳門的基督教才有一些發展。^④該文的觀點與前面幾文大體相當。

有關澳門基督教發展史的研究，論文方面還有邱樹森的《略論明清時期的粵澳宗教文化交流》等論文，^⑤從內容看來仍屬概述性的文字，史料和觀點都有相通之處。當然，但凡涉及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學界必會提到基督教在澳門的早期起步，這方面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在此不再贅述。

二、近代澳門基督教傳教士與教會（差會）研究

從馬禮遜開始，整個近代中國有諸多歐美基督教傳教士和教會（差會）在澳門停歇和傳教，因此有關澳門基督教傳教士及所在教會（差會）方面的研究也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

基督教進入中國內地前，很多傳教士都在澳門待過或長或短的時間，除了傳教外，有的學習中文，有的開辦診所，有的從事教育，還有的加入到外國商行從事商業活動的，更有甚者，參與到西方列強對華的政治和商務談判中。這些傳教士包括馬禮遜、米憐、伯駕（Peter Parker）、叔未士（Rev. J. L. Shuck）、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麥嘉締（Divie Bethune McCartee）、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婁禮華（Walter M. Lowrie）、裨治文（Elijah Coleman

① 李桂玲：《澳門的宗教》，《中國宗教》（北京）1995年第2期，第55頁。

② 藍欽文：《澳門基督教簡介》，《天風》（上海）1999年第11期，第10頁。

③ 周大寧：《漫說澳門的宗教》，《四川統一戰線》（成都）1999年第8期，第10—11頁。

④ 劉先覺、許政：《澳門的宗教建築》，《華中建築》（武漢）2002年第6期，第88頁。

⑤ 邱樹森：《略論明清時期的粵澳宗教文化交流》，《東南文化》（南京）2001年第5期，第45頁。

Bridgman)、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其中,馬禮遜是基督教第一位來到澳門的傳教士,衛三畏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在澳門生活時間最長的美國人,有一段時間幾乎是在澳門唯一的美國人。

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有關近代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的文章並不缺乏傳教士個案研究,這方面的成果很多。從中國知網上查閱,僅“馬禮遜”研究就可以搜出一千餘詞條,篇名冠以“馬禮遜”的文章也有100餘篇。涉及馬禮遜與澳門的論文也有數十篇,只不過裏面很多文章表述的內容大致相同。其中比較有特點和價值的論文有蘇精在2007年發表於《國際漢學》的《馬禮遜史料舉隅》,這可謂是對學界在馬禮遜研究上的一篇方向性指路文章。作者選取了馬禮遜來華第一天的日誌、馬禮遜自澳門致倫敦會司庫函、《雜聞篇》創刊號等內容,從檔案着手引導學界加強馬禮遜方面的研究。^①陳才俊在2008年發表的文章《馬禮遜與早期中英外交關係考析》,該文考析了馬禮遜出任澳門東印度公司譯員、參與中英衝突交涉、作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團秘書訪京、出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秘書兼翻譯等史實。文章中特別提到,馬禮遜在擔任澳門東印度公司譯員期間,通過對中國政治體制與基本國策的不斷瞭解,摸索出一套自主處理兩國事務的外交思想。^②此外,由英國人歐內斯特·博克斯(Ernest Box)著,譚樹林和鍾凌學翻譯的文章《馬禮遜、米憐和麥都思——新教在華傳播的三位先驅》、^③晏可佳的《馬禮遜傳教事業的回顧與評價》,也都是馬禮遜研究的佳作。^④呂堅在《從新發現的有關馬禮遜梁發傳教檔案看新教的傳入及影響》一文,從一件有關馬禮遜和梁發傳教活動的清代檔案展開研究,認可衛青心所言“自16世紀以來,澳門始終是所有歐洲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的一個中轉站和逐出中國的傳教士藏身的地方”之言。^⑤據《中華最早的布道者——梁發》一書附錄中記載,梁發於1833年在澳門著有《祈禱文讚神詩》,共60頁。此書與其他書一併被清官府派人前往澳門時查獲,並查拿梁發、屈亞昂等人,可見這一事件與基督教在華傳教活動不斷升級有着密切關係。從檔案中屈亞昂的供詞來看,其父屈亞昂與梁發(亞發)自道光十二年(1832)以後同為馬禮遜所僱,在澳門刊印和宣傳《聖經》書籍。通過這件檔案,作者認為有三點認識值得注意:第一,自道光十五年以來英國船只在中國沿海遊弋,並向中國民眾大肆散發宣傳《聖經》的印刷品,由此而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注意和警惕;第二,道光十六年廣東地方官於澳門“夷樓”查獲了八種有關宣傳《聖經》的印刷品,並拿獲了印刷工人屈亞昂、查傳了馬儒翰;第三,自道光十二年以來馬禮遜就僱用中國印刷工人梁發、屈亞昂父子在澳門刊印有關宣傳《聖經》的中文書籍。至清官府查辦此案時,馬禮遜已病故二年,梁發、屈亞昂已逃匿於新加坡。^⑥

其他在澳門開展過活動的傳教士研究,也有一些不錯的成果。如湯開建、張照根據英國循道公會在澳門的信函檔案,分析了英國循道公會傳教士們,尤其是俾士(Piercy)牧師早期在澳門

① 蘇精:《馬禮遜史料舉隅》,《國際漢學》(北京)2007年第2期,第113—123頁。

② 陳才俊:《馬禮遜與早期中英外交關係考析》,《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08年第5期,第113頁。

③ [英]歐內斯特·博克斯(Ernest Box):《馬禮遜、米憐和麥都思——新教在華傳播的三位先驅》,譚樹林、鍾凌學譯,《國際漢學》(北京)2007年第2期,第141—156頁。

④ 晏可佳:《馬禮遜傳教事業的回顧與評價》,“傳教運動與中國教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上海,2006年11月。

⑤ 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67頁。

⑥ 呂堅:《從新發現的有關馬禮遜梁發傳教檔案看新教的傳入及影響》,《歷史檔案》(北京)1996年第4期,第93—98頁。

期間的傳教情況、教會內部事務以及當時的傳教環境等問題，補充了在香港開埠後澳門基督新教活動的新材料，同時指出了澳門在循道公會早期對華傳播中的重要地位。^①此外湯開建、顏小華的《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②譚樹林的《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活動研究（1834—1857）》、^③田力的《長老會傳教士麥嘉締研究》、^④吳義雄的《美國傳教士婁禮華在華活動述論》、^⑤顏小華的《美國傳教士婁禮華及其筆下的近代澳門與香港》、^⑥顧均的《從書信看衛三畏在澳門的活動》、^⑦鄭二瑜的《論美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彼得·伯駕在華的傳教事業》、^⑧吳寧的《早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夫人在澳門的活動》等等，^⑨都是這方面的研究佳作。

另外，林芸在《早期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一文中，^⑩以1830—1844年為時間點，對在澳門開展活動的早期美國傳教士進行論述。這批傳教士包括第一批來華的美國人雅裨里（D. Abeel）和裨治文，第一位以澳門為基地開展傳教工作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衛三畏。作者認為，當時清政府禁止外國人公開傳教，自清朝初年頒佈了禁止天主教傳教的禁令後，清政府對於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基本上是禁止的，對傳教士在廣州、澳門的活動也作了嚴格的限制，他們的工作只能秘密地進行。裨治文和其他人不得不“關門”，而且經常是“鎖門”地為中國人舉行宗教儀式。為打開傳教局面，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活動主要集中在出版印刷、醫藥、教育等方面。裨治文創辦的《中國叢報》，裏面有一些重要的傳教士都是撰稿人，包括裨治文和衛三畏。《中國叢報》於1939年5月遷往澳門發行，不僅以通俗的形式向外國人介紹了中國的歷史，而且還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20年間中國的現狀。它不但幫助西方人瞭解中國，而且至今仍是研究該段歷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裨治文精通中文，除了創辦《中國叢報》並擔任主要撰稿人外，還撰寫傳播福音的小冊子，並翻譯和出版有關中國文化、世界歷史和地理的書籍。1841年，他在澳門出版了《廣東方言撮要》一書，其內容豐富，涉及中文、商務、機械、建築、農業、礦物等17個章節，是美國人撰寫的第一部以英中文對照形式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有學者認為“它對溝通中美語言文字有開拓之功”。^⑪

吳義雄在《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一文中詳細地論及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其文記載，澳門自16世紀以來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活動的初期，將澳門作為重要的活動基地。馬禮遜、裨治文、衛三畏等傳教士，都有在澳門長期居住和活動的經歷。新教傳教士所舉辦的文化活動和事業，特別是“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馬禮遜教

① 湯開建、張照：《英國循道公會澳門檔案中的早期傳教士活動》，《中國文化研究》（北京）2004年第3期，第144—152頁。

② 湯開建、顏小華：《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暨南學報》（廣州）2005年第2期。

③ 譚樹林：《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活動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

④ 田力：《長老會傳教士麥嘉締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⑤ 吳義雄：《美國傳教士婁禮華在華活動述論》，《中山大學學報》（廣州）1998年第4期。

⑥ 顏小華：《美國傳教士婁禮華及其筆下的近代澳門與香港》，《蘭州學刊》（蘭州）2006年第7期。

⑦ 顧均：《從書信看衛三畏在澳門的活動》，《中華讀書報》2014年12月3日。

⑧ 鄭二瑜：《論美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彼得·伯駕在華的傳教事業》，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⑨ 吳寧：《早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夫人在澳門的活動》，《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南寧）2005年第3期，第147—152頁。

⑩ 林芸：《早期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學術研究》（廣州）1997年第10期，第69—72頁。

⑪ 梁碧瑩：《早期中美文化交往》，《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二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3頁。

育會”和“中國醫務傳道會”的一系列活動，都與澳門有着密切的關係。他們的許多影響深遠的著作都是在澳門撰寫和出版的，其中最為著名的有馬禮遜翻譯的中文《聖經》、他所編著的《華英詞典》和裨治文、衛三畏編輯出版的英文《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同時作者也提到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活動是特殊的歷史條件所造成的結果，為時並不太長。但就在這數十年時間中，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為，值得研究者給予應有的關注。^①

有學者認為，中國近代的第一座博物館應是澳門博物館，它的籌建與傳教士密不可分。鴉片戰爭前，隨着來華傳教士、商人的增多，他們及其眷屬每年大多會在澳門落腳、旅居和住冬。李軍在研究中認為：“同一時期的英國充斥着對於自然世界的好奇和科學探索精神，收集和展示稀有博物標本、奇珍異品以彰顯帝國想象的情緒普遍高漲。因此，當英國人隨着商貿或殖民擴張落腳於世界各地時，他們對博物學的愛好也隨之而行。”^②這些英國外交領事、旅行者、商人等往往也熱衷於探索自然世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與英國本土的博物學界保持着密切的往來，早期到澳門從事貿易的部分英國商人同樣如此。^③貿易季節以外，這些英國商人有大量的閒暇時間在澳門及附近地區開展博物學調查、收集和展示。隨着收集到的博物標本日益增多，幾位創始人於1829年2月22日開會籌劃在澳門設立“駐華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in China*）。這幾位創始人包括約翰·羅素·里夫斯（John Russell Reeves）、亨利·馬修·克拉克（Henry Matthew Clarke）、喬治·韋切爾牧師（Reverend George Harvey Vachell）。當時馬禮遜也參與了該博物館的籌建工作，並記錄說該博物館以自然史和藝術品的收藏、展示為主。創辦當年，該博物館由韋切爾牧師擔任館長，並在收取一定費用的基礎上向所有英籍人士開放。^④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終結，該博物館也隨之關閉。據李軍在其文章中介紹，除《馬禮遜回憶錄》外，《廣州記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廣東雜錄》（*The Canton Miscellany*）、《亞洲學報》（*Asiatic Journal*）及其他歐洲報刊雜誌，以及曾遊歷該博物館的相關人士都有該博物館的文字記錄資料。^⑤這些史料說明，1829—1834年間，澳門確實在傳教士的幫助下建立起了一座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很可能就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此外，郭永亮在翻閱澳門殖民政府各重要機關文庫所藏歷史文獻後也表示，182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曾在澳門建立“英國博物館”。^⑥2004年顧長聲翻譯的《馬禮遜回憶錄》也提到1829年馬禮遜曾在澳門籌設“駐華英國博物館”；而2008年顧均等重新翻譯出版的《馬禮遜回憶錄》則公開了該回憶錄中所有有關該博物館的記載。^⑦2011年翻譯出版的范發迪（Fan Fa-ti）的著作也指出19世紀20年代末，韋切爾

① 吳義雄：《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學術研究》（廣州）2002年第6期，第48頁。

② 李軍：《19世紀西人在華博物館的兩種類型——兼論中國最早的博物館》，《東南文化》（南京）2015年第4期，第98頁。

③ [美]范發迪：《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袁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頁。

④ Eliz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p. 424, 427.

⑤ 李軍：《19世紀西人在華博物館的兩種類型——兼論中國最早的博物館》，《東南文化》（南京）2015年第4期，第99—100頁。

⑥ 郭永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9）——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91—92頁。

⑦ [英]艾莉莎·馬禮遜（Eliza Morrison）編：《馬禮遜回憶錄（2）》，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翻譯組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15頁。

牧師等人曾計劃設立一座博物館，儘管范發迪認為該博物館並沒有真正建立。^①雖然該博物館的籌建歷史還存在許多需進一步探究的細節，但對傳教士的研究無疑會促進澳門文化史及中國博物館史的研究。

對近代澳門基督教教會（差會）的研究，這方面的學者有湯開建、張照、吳寧和筆者等人。湯開建、顏小華在《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一文中提到，隨着基督新教的東傳，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於鴉片戰爭前後多次派遣傳教士前往澳門開展佈道、學校教育、印刷出版等活動，並制定相關傳教方略，為隨後進入內地的傳教工作做好了充分準備。^②澳門自明代以後繼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基地。張照在《清末民初循道公會在華南地區的發展》中以一節的篇幅論述“循道公會傳教士在澳門的主要活動”。他在文章中提到：澳門並不是循道公會廣州教區的聯區之一，但是澳門在循道公會在華傳播的歷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一方面，澳門擔當了循道公會傳教士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及以後的避難所和療養地的角色；另一方面，循道公會在華的第一批華人教友就是在澳門舉行的洗禮。^③吳寧在《美南浸信會在華南傳教活動研究（1836—1912）》一文中提到，美南浸信會華南區經歷了由“澳門開始—香港立足—廣州發展—廣西延伸”的傳教歷程。也就是說，澳門是美南浸信會敲開中國大門，開展傳教活動的第一站。文章通過檔案史料，對美南浸信會在澳門的第一位傳教士叔未士進行了詳細分析，並認為叔未士進入澳門傳教時，澳門已有英國倫敦會、美國美部會以及荷蘭傳教會的傳教士進行傳教活動。這些差會的傳教士在澳門和廣州之間往來，等候中國大門對他們的開放。^④1841年，叔未士夫人將她在澳門利用閒暇時間完成的53卷的《中國印象》（*Brief Sketches of Some of the Sen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or Senses of China*）寄回美國，此書於1851年出版，成為19世紀後期美國瞭解包括澳門在內的中國情況的一份重要文件。

三、近代澳門基督教印刷業和辦刊研究

有關傳教士在澳門開辦的現代印刷業活動，學界做了一些梳理，並就傳教士試制漢文鉛活字的問題作了評述。馬禮遜到澳門傳布基督教後，為了刊印《聖經》以便利傳教，他開始雕刻中文字模，預備鑄造中文鉛字。馬禮遜的行為受到當時地方官吏的禁止，於是派美國人米憐及中國人蔡高、梁發於1814年將印刷業移到馬六甲並創設印刷所繼續工作。宋原放、李白堅著的《中國出版史》一書提到：“（馬禮遜）到澳門後，為在中國傳教的方便，開始研究中文，並着力於推行適用於漢字的現代印刷術。他當時曾僱人秘密鑄刻字模，但因事機洩漏，被官方知道。刻工怕罹禍，把所刻字模毀之一炬。”^⑤此外，徐健在《最早試制漢文鉛活字的人是誰？》一文中稱，還有一些專著、論文等都說漢文鉛活字“字模”的創制始於馬禮遜。而據其文分析，比較有把握地

① [美]范發迪：《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袁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頁。

② 湯開建、顏小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中南民族大學學報》（武漢）2006年第1期，第115頁。

③ 張照：《清末民初循道公會在華南地區的發展》，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24頁。

④ 吳寧：《美南浸信會在華南傳教活動研究（1836—1912）》，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39頁。

⑤ 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第181頁。

認定，英國倫敦佈道會的牧師撒母耳·戴爾（Samuel Dyer，有些文章和書籍也譯作台約爾）才是試制現代漢文鉛活字的第一人。他舉證說G·麥金托什的《在華早期的教會書館》一書第一章在介紹澳門美國長老會書館最初創立情景時記載：“書館由理查德·柯爾負責，於公元1844年2月23日搬抵澳門……4月1日，書館收到了保羅·瓊斯等從美國運來的323個字模……由於新開張的長老會書館使用了新字模，使鉛字印刷得到很大改進。這些字模（除了從美國收到的以外）是由倫敦駐新加坡教會撒母耳·戴爾制造的。這位努力不懈的工作者在1845年逝世前完成了1845副字模沖頭。”^①

早期在澳門由基督教創設的另一個印刷機構，其出現應歸功於美國北部長老會。筆者在《美北長老會在華南的活動研究（1837—1899）》一文中曾提到，美國長老會在澳門所開展的事工，除了佈道和教育之外，最有影響的要數印刷出版。1844年2月，長老會傳教士麥嘉締牧師和印刷工人柯理一起來澳門，並帶來印刷機器和中、英文字模。其中幾千個漢字字模都是由婁禮華的父親奧爾特·婁瑞主持策劃，並於幾年前在巴黎制成的。這批機器和字模，為澳門美國長老會印刷所的成立奠定了基礎。該印刷所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很快投入使用。當時主辦者僅有美國經理1人、中國排字工1人、印書人員2人而已，而在6月印出了一批傳教材料。在澳門期間，該印刷所由柯理負責。柯理雖精通印刷業務，但對中文卻一無所知。因此，幾千個漢字字模的編排和整理工作，以及中文書籍的印刷業務，就交由婁禮華牧師承擔，或由其提供幫助。婁禮華在此方面花費了大量時間，並在澳門出版了自己的早期作品，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貢獻。^② 1845年7月19日，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柯理夫婦帶着印刷機器從澳門抵達寧波，隨後命名“華花聖經書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有些資料亦稱“花華聖經書房”，“華”，指中國；“花”，指花旗國，即美國）的印刷所在寧波江北岸盧氏宗祠內投入使用。^③ 這是外國人在中國大陸經營的最早的一批印刷企業之一。

1833年，馬禮遜在澳門發行周刊《雜聞篇》（*Tsu-wan-pien, A Miscellaneous Paper*），該刊採用中英文對照形式編印。刊物以外籍傳教士為對象，每期四頁。《雜聞篇》的目的是介紹中國人的思想及社會觀念，將中文文章與英文翻譯並排而列。新來的外籍傳教士可以借此瞭解中國，同時也可以學習中文。因此，從其創刊目的來看，該刊內容並非新聞性質，但在中國報業史上，它卻是第一本中英文對照的雜誌。當時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澳門創設了亞本印刷廠（Albion Press），有從英國運來的新平版印刷機，專門負責承印《雜聞篇》。《雜聞篇》出版後，駐澳門總主教對馬禮遜創辦的這本雜誌表示不滿，澳門的葡萄牙總督遂即取得東印度公司的同意，派員到亞本印刷廠，制止印刷《雜聞篇》。於是這本中英文對照、純宗教性質的周刊在出版數期後便因挫折而夭折。翌年8月1日，馬禮遜死於澳門，年僅52歲。可以說，馬禮遜在傳教方面的最後努力，即為出版中英文對照的《雜聞篇》。據最近的研究，該刊已確定為三期。^④ 關於《雜聞篇》的更具體內容，在潘賢模的《南洋萌芽時期的報紙——近代中國報史初

① 徐健：《最早試制漢文鉛活字的人是誰？》，《津圖學刊》（天津）1995年第2期，第157—160頁。

② 顏小華：《美北長老會在華南的活動研究（1837—1899）》，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65頁。

③ 謝振聲：《江北岸的華花聖經書房》，《寧波通訊》（寧波）2015年第13期，第51頁。

④ 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33頁。

篇》、^①《中國現代化報業初創時期——鴉片戰爭前夕廣洲、澳門的報刊》，^②以及蘇精的《馬禮遜史料舉隅》幾篇文章中都略有所談。^③其中蘇文介紹《雜聞篇》為不定期刊，該刊以逐字雕刻的鉛活字排印，每號四頁，每號印量多達兩萬份，交由梁發等人攜往各處散發。該刊每號內容約1,400餘字，大部分為基督教知識，少部分為倫理道德勸化之言，如父母及子女本分及孝道。當年該刊每號印量雖多，存世者卻極為稀罕。如有學者能深究其詳，必能進一步促進馬禮遜及中國教會史的研究。

另一份與澳門相關的基督教報刊是1832年5月創刊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一些學者把《中國叢報》又作《澳門月報》，然而兩者當為兩份不同的刊物，把《中國叢報》與《澳門月報》混為一談應是中國內地學界長期人云亦云之誤。^④《中國叢報》由美國最早來華的傳教士裨治文主編，1839年5月，該刊由廣州遷到澳門出版發行，這是美國傳教士在澳門出版雜誌之始。該刊在澳門發行了五年，1844年遷往香港，後又遷回廣州，1852年12月停刊。汪家熔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及其他》一文中稱：裨治文之來華，與其說是為宗教，毋寧說是為政治或侵華。《中國叢報》是“鼓吹武力侵略我國、出謀劃策、提供情報最系統、最積極的刊物”。它在1834年就不斷鼓吹對中國採取強硬路線，支持英僑增派軍艦作為交涉後盾。其中有文（1834年12月號）載：“我們認為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任何人會同意他們的主要立場，那就是採取果斷措施……中國，在他與別國的關係系上，是公然觸犯‘要愛你的鄰居如同愛自己’這條準則的……如果不能說服他，就迫使他的義務和各國的權利一致。”而下月的刊物又說：“為了公正和維護一個國家的國格而使用武力，是永遠不會受到譴責的……就中華帝國目前的態度講，如不使用武力，就沒有哪個國家能在和它的交往中保持自己的尊嚴。”次年，該刊根據非法在中國沿海偵察所得，提出了武裝侵略的“可行性”論證：“可以斷言，英國只要用一個團的兵力就可以打敗幾個省的軍隊。”^⑤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和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中各國所取得的在華利益，絕大部份都是早幾年《中國叢報》上文章中所叫囂的要求。^⑥當然，從今日來看，這份出版刊物當中還是有相當多的資訊值得我們對其進行近代中國和中西關係史研究的。

四、近代澳門基督教教會教育與辦學研究

傳教士來華初期，傳教進程可謂舉步維艱。拋開政治因素，僅就社會環境上便遇到種種困難。有一位傳教士對當時的佈道效果曾作這樣的描述：教堂往往設在街邊，聽眾寥寥，多時只是傳教士的助手和傭人。傳教士在街頭邀請路人進堂聽道，但敢於進堂的人不多，即使來了一些老百姓，他們中大多數也是來看洋人奇怪的藍眼睛和高鼻子的，或者只是來聽聽外國人奇怪的口

① 潘賢模：《南洋萌芽時期的報紙——近代中國報史初篇》，《新聞研究資料》（北京）1981年第4期，第239頁。

② 潘賢模：《中國現代化報業初創時期——鴉片戰爭前夕廣洲、澳門的報刊》，《新聞研究資料》（北京）1980年第4期，第164—165頁。

③ 蘇精：《馬禮遜史料舉隅》，《國際漢學》（北京）2007年第2期，第113—123頁。

④ 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87、191頁。

⑤ 汪家熔：《〈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及其他》，《黑龍江圖書館》（哈爾濱）1988年第3期，第78頁。

⑥ 汪家熔：《〈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及其他》，《黑龍江圖書館》（哈爾濱）1988年第3期，第78頁。

音。對外國人傳福音感興趣的當然只是少數人，大部分人在傳教士第二次來的時候就沒有興趣了。有些傳教士發現中國人很看重書籍，因此採取了發宗教宣傳小冊子的辦法來吸引聽眾。這些小冊子常常受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有時要書的人是如此之多，傳教士只得向空中拋擲小冊子，讓大家去搶，看誰能拿到本子。不幸的是，傳教士常常發現他們所發的宗教小冊子被人當作廢紙出賣和用來包東西或者做鞋底。^①傳福音要有聽眾，如何吸引聽眾呢？傳教士從街道上收容一些衣衫襤褸的窮孩子或乞丐，給他們食、住，教他們識字、讀經，這樣他們就成為傳教士的固定聽眾，於是，最初的教會教育和教會學校出現了。傳教士的妻子則教一些孤女或婢女做針線活，學習漢字和基督教教義。因此，教會教育是推動傳教發展的有效手段，這一點來華的傳教士及其教會機構都非常清楚。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有學者將馬禮遜先在馬六甲，後遷香港的英華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看作是中國基督教教育的發端，“是英國在遠東所有學院和大學的先驅”，^②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及中國基督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為西方新教傳教士為華人開辦的第一所教會學校。英華書院奏響了教會學校在中國進行英語教學的先聲，以此為據，有學者認為，如果以歷史記載來看，傳教士在華開辦的教授英語的第二所學校，當是1835年倫敦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的德國傳教士郭士臘的夫人（Mrs. Gützlaff）在澳門開辦之一所學塾。該學塾先招收女生，後又兼收男生。學校開設漢語和英語課程，英語課程先由葡萄牙人任教，學塾擴展後，改由郭士臘夫人親自任教。^③

在鴉片戰爭前為數不多的中國教會學校中，在英語教學的規模和影響上，最重要的當屬馬禮遜學校（The Morrison School），此校是1839年11月4日美國傳教士布朗（S. Brown）為紀念馬禮遜而設的，是美國傳教士在澳門開辦的第一所西式學堂，也是來華基督教在中國設立的最早學校。學界對該校的設立背景、教育模式、教學方法、創辦歷史及其影響都做了細緻的研究。早期有仇華飛的《馬禮遜教育會與馬禮遜學校的創辦》，作者認為如何看待馬禮遜教育會和馬禮遜學校在中國的活動，這一點非常關鍵，這種辦學形式在客觀上不能不衝擊當時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使科舉制向現代方向轉化。^④後期有吳義雄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一書，主要論述1807—1851年新教在華南沿海的傳佈歷史，代表了這一領域的最新學術成果，尤其是作者對英華書院、馬禮遜學校的研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⑤

有學者認為，布朗參照當時歐美教育模式並結合中國學生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切實的教學課程表。課程主要內容包括三個部分，即基督教義、各種近代西學知識和中國漢語。近代西學知識包括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學、地理學、歷史學、化學等課程。在教學方法上，布朗也一掃封建私塾死讀硬背、不求甚解、模仿作文的舊習，採取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並對學校的教學質量嚴格要求。加上學生們的勤奮好學，絕大多數學生掌握了所學的知識。馬禮遜學校在澳門開辦四

①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4；曾鉅生：《西方教會在華辦學問題初探》，《杭州大學學報》（杭州）1987年第4期，第129頁。

② Sir Lindsay Ride,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1.

③ 顧衛星：《同文館創辦前的中國學校英語教學》，《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洛陽）2003年第3期，第42頁。

④ 仇華飛：《馬禮遜教育會與馬禮遜學校的創辦》，《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上海）1995年第2期，第21—25頁。

⑤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年後，於1842年11月1日遷往香港，1849年由於經費無着而關閉。儘管該校辦學時間不長，規模不大，但它是第一所在澳門出現，由基督教傳教士創辦之正規的傳播西學的洋學堂，並培養出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新型人才。中國近代著名的改良思想家、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闈，第一位留英學生黃寬（回國後成為中國西醫學的奠基人）都是曾在該校接受教育的高材生，還有一批學生在清政府的駐外使館中充任譯員。“馬禮遜學校”實為近代中國早期教會學校的縮影，隨後的教會學校很多都仿效其制運行。

關於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特點，顧衛星以專文形式作出了論述。他從馬禮遜學校的辦學宗旨“讓當地青少年受到中英兩種語言的教育，以此為手段使他們接觸到西學的各個領域”，“根據中國自身的特點，向中國學生教授英語的閱讀和寫作，使之能以英語為媒介，了解西方文化”出發，認為馬禮遜學校在英語課程設置、師資隊伍以及教學等方面都呈現了與中國傳統私塾截然不同的教育特點。^①此外，作者也提出：我們在評價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時，應當肯定其帶來的積極作用和影響，同時也不能因為馬禮遜學校“並非單純的教會學校”，就忽視其深藏的文化侵略的動機和目的。

此外，學者們的研究也發現，近代澳門還有其他幾位美國傳教士開辦過學校，但規模都較小。^②如1835年，美國浸禮會派遣叔未士夫婦來澳門傳教，他們是美國最早到澳門傳教的浸禮會傳教士。叔未士夫婦先在澳門設立教堂，宣傳教義。1839年，叔未士夫人在澳門開辦了一所義校，極受歡迎，“它甚至博得一個吹毛求疵的觀察的贊許”。^③1844年10月22日，另一位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哈巴安德（A. P. Happer）抵達澳門。他在澳門身兼多職，既講道又行醫，同時還辦學。他開辦了一所澳門學校，招收了30名學生。哈巴安德在向學生講授科學知識的同時，並不忘向他們宣傳基督教義。1847年3月，哈巴安德轉到廣州傳教後，這所學校隨即遷往廣州故衣街續辦。^④

對近代澳門基督教教會教育作整體性研究的文章還有夏泉的《明清粵港澳基督教教會教育研究（1552—1911）》。該文提到，嘉道年間的新教教會教育，囿於清朝的“禁教”政策，只能在南洋華僑社區及穗澳興辦，但已呈現出從中國本土外圍推進至穗澳、再至沿海和內地的發展態勢。鴉片戰爭後教會教育的興辦，受到了清朝對基督教“馳禁”和“護教”政策的影響，具體而言，廣東的新教教育影響較大，澳門的天主教教育持續發展，香港則是天主教、新教教育比翼齊飛。經過幾個世紀的佈道、辦學和其他宣教活動，基督教業已深深植根於粵港澳社會，對這些地區的思想、文化、教育、活動乃至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產生了至深且巨的影響。^⑤文章對馬禮遜學校在澳門的創校經過，晚清澳門教會教育的興辦與發展及特點進行了詳細論述。

也有學者在研究近代中國特殊教育的時候，提出澳門與中國最早的近代範式的特殊教育有關。例如，在郭衛東的《論中國近代特殊教育的發端》一文中提到，從查閱到的資料來看，中國最早對盲人施行近代特殊教育的地點在澳門。^⑥原因是1834年，傳教士郭士臘進入澳門，其夫人

① 顧衛星：《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蘇州大學學報》（蘇州）2000年第1期，第94頁。

② 林芸：《早期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學術研究》（廣州）1997年第10期，第70頁。

③ [美]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早期中美關係史》，陳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11頁。

④ 湯開建、顏小華：《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暨南學報》（廣州）2005年第2期，第110頁。

⑤ 夏泉：《明清粵港澳基督教教會教育研究（1552—1911）》，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⑥ 郭衛東：《論中國近代特殊教育的發端》，《教育學報》（北京）2007年第3期，第91頁。

隨行，次年9月30日，在“印度與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的贊助下，設“澳門女塾”，附帶招收男生。前文提到的近代向西方學習的先驅容闈，因家境清貧，七歲就被送入郭士臘夫人在澳門的這所寄宿學校讀書。1839年，中英關係因鴉片問題而緊張，廣東當局下令逐英人離華（包括澳門），郭夫人係英人，於是女塾停辦。曾在塾中就讀的容闈記載：“其後此塾因故停辦，予等遂亦星散。古（郭）夫人攜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經予教以凸字讀書之法。及予輟教時，彼等已自能誦習《聖經》及《天路歷程》二書矣。”^①這是我們所見到的教會在華招收盲人授教的最早記錄，反映了基督教在華辦學之初就已經向殘障人群打開了大門。當然，教學方式還不能說是先進，主要是採取學生教學生的方法，教學內容也主要局限在宗教方面。但不管怎麼，澳門女塾以盲女為教學對象，凸字法又是近代的盲字法，其已開中華近代盲教育乃至盲生留學教育的先河。

五、近代澳門基督教醫療活動研究

提供醫療服務和教會教育是早期基督教傳教的兩種有力手段。近代中國教會醫療的起步也是發軔於澳門。對此，學界也有頗多論述。

1820年，馬禮遜與東印度公司一名外科醫生李文斯頓（J. Livingstone）合作在澳門創設了贈醫所，次年擴大為醫院，以治療眼疾為主。這是傳教士在澳門開辦的第一所教會醫院。1827年東印度公司的另一名外科醫生郭雷樞（T. R. Colledge）在澳門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實行免費治療。由於郭雷樞熱心地為當地群眾解除疾苦，贏得了多方面的讚揚和感謝。“中國人常以水果鞭炮等為酬”，^②不過，由於缺乏人手，這所澳門醫院被迫於1832年關閉，遷往廣州重開。

隨後，應“中華醫藥傳教會”的要求，美國第一位醫藥傳教士伯駕受美國公理會的派遣來到中國，他於1838年7月5日在澳門開設了一所眼科醫院。這是美國傳教士在澳門開設的第一家醫院，伯駕也成為第一位到澳門的美國醫務傳教士。醫院建立沒多久，就贏得了當地人的信任。從1838年7月5日到10月1日近三個月的時間裏，共有近700名病人接受了伯駕的治療。儘管開設的是眼科醫院，除眼疾外，其他各科疾病也在伯駕的治療範圍之內。三個月後，伯駕因廣州眼科醫局的重新開張而離開澳門，醫院暫時關閉。不久，英國倫敦會派遣了另一名資深外科醫生雒魏林來澳門接替伯駕的工作。^③此外，為協助雒魏林，1839年美國公理會又派醫務傳教士威廉·迪弗（W. Diver）、倫敦傳教會派本傑明·霍布森（Benjamin Hobson，也有學者譯作“合信”）醫生來澳。霍布森早年畢業於倫敦大學醫科，其後成為英國倫敦會的傳教醫生。^④1840年8月1日，醫院重新開張，迪弗由於健康原因，於1841年返回美國，雒魏林亦因有新的傳教任務離開澳門前往舟山，醫院便主要由霍布森負責。從1840—1841年7月，共有1,457位病人到該院就診；到1842年7月，已達到5,265人。^⑤病人不限於澳門，鄰近市縣及外省也有慕名而來者，其中有中下層百姓，也有政府官員。1843年初，這家醫院遷往香港。霍布森在行醫期間，於1850年編譯出版《全體新論》（原名《解剖學和生理學大綱》，*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這是一本高質量

① [清]容闈：《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頁。

②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71頁。

③ 韓清波：《傳教醫生雒魏林在華活動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4—15頁。

④ 劉澤生：《合信的〈全體新論〉與廣東士林》，《廣東史志》（廣州）1999年第1期，第54頁。

⑤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465; Vol. XI, p. 659.

的醫學著作，對後世深有影響。

學界在研究教會醫療過程中，也對傳教士在澳門關注中醫學的情況進行了探討。如郭強、李計籌在《〈印中搜聞〉視域中的中國醫學》一文中專門探討了馬禮遜和李文斯頓在澳門關注中醫學的情況。馬禮遜和李文斯頓合作在澳門開設診所後，專門聘請了一位姓李的中醫名醫和一位藥劑師相助應診，並為他們介紹中醫藥知識。在此之前，馬禮遜“由於急切地想要尋找關於中國人的疾病和治療方面的記錄信息，在人口稠密且非常繁華的廣州城裏購買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國醫書，總共800多卷”。^①當時，李文斯頓在澳門居住已有12年，有機會接觸和觀察一些重要的病例，因而很快完成了報告，並刊登在《印中搜聞》上，不過他說在文章裏不太適合討論專業性的內容，僅呈現他所觀察到的情況。馬禮遜和李文斯頓因此對中醫藥產生極大興趣，他們親眼地看到澳門診所的那位李姓中醫治好了許多患者，兩人均認為“在對中醫作出正確的評估，並對中醫的技術給予準確的解釋之前，有必要調查中醫藥系統，去診所對中醫藥的療效作長期仔細的觀察”。^②自1820年起，李文斯頓在《印中搜聞》上連續發表了3篇關於中醫學的文章，以期讓西方更多地關注和研究中國醫學。^③

六、近代澳門基督教建築研究

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東西方風格共存的建築群之一。這些建築裏面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元素，如澳門基督教教堂和中國最古老的基督教墳場。

劉先覺、許政在《澳門的宗教建築》中提到：早期澳門基督教教堂有兩座，一是馬禮遜教堂，位於舊基督教墳場內，在與東方基金會會址相連的永久墓園內。這座基督教禮拜堂建於1821年，是澳門最古老的基督教堂，曾於1922年把門窗重修作拱形設計，門前放幾張小圓凳，周圍環境清靜優雅，教堂內只有十張長椅，頂部保持原有屋樑、椽子，具有古樸風格。教堂後面是基督教墓地，埋葬西方基督教會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及其子也葬在那裏。二是志道堂，全稱“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位於澳門馬大臣街，由當時澳門地方紳士崔諾權介紹李星泉醫生購置了蕉園圍的兩間小屋，並向政府申請房前屋後荒地，於1917年10月建成。內設小學，後經募集資金，擴充校舍，發展為蔡高紀念學校，包括中學、小學和幼稚園。1970年代改由聖公會辦理蔡高中學，搬遷至白馬行街，舊校舍被拆，建新大廈。^④

除了教堂外，澳門基督教墳場也是學界關注的內容，它見證了澳門基督教發展的一段重要歷史。王連偉在《基督教墳場——見證澳門宗教文化史》一文中提到：澳門教眾大多為天主教徒，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人相對較少。因此，在澳門眾多的教堂中，只有一座基督教堂——馬禮遜教堂。馬禮遜教堂位於白鴿巢公園東側基督教墳場前面，這座教堂與其後面的基督教墳場，因

① J. Livingston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No. 14 (1820), p. 427.

② J. Livingstone, "Treatment of Certain Diseases by Chinese Doctors,"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No. 15 (1821), p. 6.

③ 郭強、李計籌：《〈印中搜聞〉視域中的中國醫學》，《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廣州）2015年第4期，第768—769頁。

④ 劉先覺、許政：《澳門的宗教建築》，《華中建築》（武漢）2002年第6期，第89頁。

其宗教文化歷史淵源，成為澳門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景點。^①對此，澳門基督教會在其刊物上撰文指出：在澳門25處世界文化遺產中，基督教墳場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可以說是中國基督教會歷史的一項盛事。在澳門基督教墳場的編號中，共有169個墓葬，大多為來華的英國傳教士、商人、東侵的殖民者、鴉片戰爭中死去的英國將領等，其中還有部分其他國家的教徒。而長眠此地最著名的人物是英國倫敦會海外傳教先驅馬禮遜牧師及其兒子馬儒翰，19世紀遠渡東土尋求靈感的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還有時任英國海軍軍官、當時還沒有出名的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叔父也安葬其間。可以說，澳門基督教墳場見證了一段澳門宗教文化史。張帝莊、孫樹坤發表的《澳門世界遺產十大“補遺”》一文，也談到了澳門基督教墳場的建立時間（1821年），埋葬的主要人物（有英國、美國、丹麥、荷蘭、德國、瑞典等傳教士、士兵、商人和畫家）。^②關於基督教教堂和墳場的論文，還有署名溪水的《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和陳小鐵的《東西方文化共融的建築群——澳門教堂印象》，這些文章都很簡單，純屬介紹性和描述性文字。^③

七、對現有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的思考

綜上所述，自馬禮遜作為基督教傳教先驅進入澳門始，基督教在澳門已經有兩百餘年的歷史。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期刊就開始收錄近代澳門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且有較為豐富的數量，包括傳教士個案、教會發展、教會事業（教育、醫療、出版、文字事工）等內容，都出現了一些不錯的作品。然而，在對前人成果進行羅列梳理和分析後，可發現當中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部分文章史料堆砌，理論探討嚴重不足。有的文章羅列了大量的史料，卻缺乏必要的甄別和考證，史實陳述含混不清，前後錯節或矛盾，給後學者研究和學習帶來疑惑。二是一些論文大量徵引他人成果，卻無注明出處或注明不詳，難以令人信服。三是涉及中國基督教史的文章，多會提到這段歷史，但多為泛泛而談，且人云亦云，人錯己亦錯。四是從前人研究澳門基督教史的內容來看，也存在較大的缺陷。以往的研究中，多數成果涉及鴉片戰爭前後時期的澳門和基督教，但對後來（尤其是19世紀後半葉及20世紀上半葉）的情況，包括傳教士在澳門的整體性研究則很少。儘管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將目光和行動轉移到香港和中國內地，但期間仍有一些基督教史跡在澳門呈現。澳門不僅是早期來華傳教士學習語言、傳教實踐體驗和了解中國的窗口，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時期在華傳教士休假休閒、養病生息選擇的場所。例如，在廣州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及其家眷就很願意選擇在澳門休假。他們時而在廣州，時而在澳門。在部分傳教士眼中，廣州與澳門，幾乎合二為一。在他們看來，澳門近似廣州的郊區。另外，澳門也是近代在華傳教士躲避各種災難的避難所。中國近代歷史上出現過多次大規模的排外反教風潮，以及中外戰事、軍閥混戰和日本侵華戰爭，每遇危機，傳教士和教會往往選擇偏居相對安寧的澳門進行避難，躲過災情。這在來華傳教士的日誌、書信和教會檔案中屢屢出現。在特殊年景，教會需要以澳門作為財

① 王連偉：《基督教墳場——見證澳門宗教文化史》，《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7月4日，第3版。

② 張帝莊、孫樹坤：《澳門世界遺產十大“補遺”》，《明日風尚》（南京）2007年第2期，第67頁。

③ 溪水：《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上海集郵》（上海）2005年第11期，第13頁；陳小鐵：《東西方文化共融的建築群——澳門教堂印象》，《中國建築裝飾裝修》（北京）2011年第7期，第249頁。

物和商品中轉站，一些教會物資通過澳門進行周轉，從海外進入中國內地。一些傳教士也由澳門返回家園，或由家鄉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因此澳門一直是基督教往返的中轉站。但是，學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尚為薄弱，無法全面瞭解和認識澳門在近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影響。

此外，在整個近代中國時期，在澳門逗留或活動過的傳教士，或多或少都會對澳門的社會風貌和風土人情（宗教、文化、習俗、城市、政治、制度等）進行瞭解，形成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們是怎樣看待澳門的天主教的？他們在澳門的社會境遇如何？他們對澳門社會發展變遷持甚麼態度？他們如何與近代澳門社會相適應？他們怎樣融入澳門這個多元文化的大家庭？澳門基督教與非基督教社區的關係及其經濟文化生活如何？有關這些方面的課題，都需要學者進一步加以探索和研究。

基督教在近代澳門的起步、發展，反映了這段時期近代澳門的發展與變化。基督教作為近代來華的一種新的文化和勢力，它與天主教等其他宗教文化一起，和澳門土生傳統文化容融共生於斯，彼此相互包容、相互滲透，成為今日澳門多元文化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基督教增添了澳門文化的多元化色彩。澳門至明末開始受外界重視，不同膚色的人群來到這裏，使澳門社會對基督教的到來有了一份同樣包容的情懷。今日澳門基督教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澳門這個國際化都市的開放、包容和接納。因此，基督教與近代澳門有着密切的關係。澳門作為開放性和包容性很強的多元文化社區，瞭解基督教在近代澳門社會的境遇和歷史，必然也有利於進一步拓展近代澳門史的研究。因此，筆者認為，未來澳門基督教史的研究，應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和突破：

一是繼續推進澳門基督教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並實現史料的數據化與資源共享。當前，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包括澳門史在內的學界研究，已經進入到e考據時代，實現文獻數據化與資源共享是學術研究的一大趨勢，因此我們應該注重資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和數據庫的建設，以便於澳門基督教史，甚至是澳門史、澳門學的資料檢索和運用。

二是在加強澳門基督教史的研究上，要注重比較研究。這種比較既有時空觀的比較、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比較，也有大歷史與小歷史的比較。例如，加強澳門基督教史與澳門天主教史的比較研究、澳門基督教史與同處同一區域的香港基督教史的比較研究，澳門基督教史在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或全球史）不同背景下的比較研究等等。通過比較，可以探索比較雙方之間的共性，也可以瞭解其特殊性與複雜性，從而增進澳門史的認識與研究。

三是加強澳門基督教史，甚至是澳門史、澳門學與外界的進一步交流與聯繫。堅持積極的開放態勢，放寬歷史的視野，讓學界與社會更多地認識澳門、瞭解澳門、探求澳門豐富的歷史文化，並推動澳門學的發展，推進澳門的文化建設。

[責任編輯 陳超敏]